



周立波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作家。他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鼓舞下走上深入中国革命和人民生活中，汲取创作营养，写出

反映时代变迁和山乡巨变的小说，成为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着眼于周立波在湖南、上海、延安、东北、北京等生活、学习、工作、写作的地理空间，对相关研究成果进行简要的学术梳理，进一步认识一位为人民写作的作家的成长之路。感谢学者卓今为本期从策划到组稿所做的努力。

——主持人：阎晶明

上海是周立波走上革命和文学道路的重要驿站，也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上海，是周立波脱离自发的爱国青年的激愤情绪，成长为真正自觉的无产阶级革命者和革命作家的起点。在湖南省立第一中学求学之时，周立波已濡染大革命的气息，受到当地共产主义活动的外围影响。但真正令他有了矢志于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投身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写作的自觉的，还是“备尝了艰苦和欢喜”的10年上海生活。

对于这段既“艰苦”又“欢喜”的人生经历，既为周立波同乡，又与其长子长时间共事的研究专家胡光凡，在所著《周立波评传》当中，提供了一份颇为翔实且可信的记载。

在他看来，周立波在上海所品尝到的艰辛，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蜚居亭子间的困窘生活，以致不得不撰文、译书等以维持生计；另一方面是提篮桥牢狱之灾。后者既令他数年间失去人身自由，同时也激发了他对构陷者的愤恨。由此，或因流徙生活的拮据而有志愿摆脱羁绊的笔名——立波(Liberty 英语“自由”音译)，也便有了另一重新意。

但与此同时，上海也是周立波的人生“欢喜”之地。1928年夏来到上海不久，周立波也在求学的初衷之外，发现了自己浓厚的文学兴趣。而在其时，有着“东方巴黎”之誉的上海，恰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镇。特别是大革命失败前后，一大批当时在中国文坛上有着崇高威望的文艺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叶绍钧等，齐聚于此。沪上文艺的繁荣，以及对革命事业受挫的省思，极大地推动了文艺干预社会现实的力度。周立波也在此期间初露才华，于1929年11月29日在《申报·本埠增刊》上发表了自己的处女作——散文《买菜》，就此揭开了他文艺创作的序幕。1934年10月，第三次返回上海的周立波，经周扬介绍，正式参加“左联”，并加入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从此踏上了一条为无产阶级革命及其文艺事业奋斗终生的赤诚之路。

迄今，正如现有研究所示，周立波早期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仍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远不及其中后期文学活动的相关研究。这种不充分，自然有这一时期他的文学创作、理论与批评实践，还相对显得不够纯熟的因素，并且也多少同周立波早期文学活动现存相关原始文献资料的缺乏有关。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研究本身不重要，毕竟上海自一开始便是其走上革命及革命文艺道路的历史起点。

正如周扬在回忆文章《怀念立波》的文章里所写的，周立波投身革命的经历并非一帆风顺，起初清贫却怀着救国热忱的周立波，也曾“在左倾盲动主义路线的影响下”，遭遇过革命道路上的成长挫折。因此，身陷囹圄的个人苦难，也成了锻炼他作为革命者的考验。

借助《麻雀》《纪念》等5篇小说，我们可以看到，失去自由的监狱生活，既令周立波看清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权互相勾结、沆瀣一气的丑恶，也让他从自己身边的共产党员狱友们身上感受到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者坚定信仰、勇于牺牲的伟大情怀，更让他明晰在苦难的中国，真正的自由从来都须以鲜血和生命去斗争和夺取的。在此意义上，诚如庄汉新所言，周立波“共产主义的一课，是在敌人的监狱中上的”。

至于周立波出狱后参加“左联”文艺活动方面，研究者如胡光凡、吴肇荣、皮民辉、丁晓原、季水河与刘中望等，大多注意到了他在文艺理论与批评、苏俄文学翻译方面的用力。胡光凡甚至认为，上海时期的理论与批评探索，已然促使周立波成了名副其实的“新现实主义理论的探索者”。这些，以及周立波在此间的早期散文和诗歌写作等，均为其日后的文艺写作提供了前期的储备。而这也意味着，上海时期的周立波研究，不论从作家个人写作还是从中国红色文艺的发生来看，依旧有着尚待继续深入乃至全面开掘的革命史和文学史意义。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进入东北：革命道路与文学追求的双轨同向

□王瑞瑞

东北对于周立波来说，既是实现革命理想的热土，又是滋养文学根芽的沃野。他用行动改变东北工农的生活，用文字书写他们的心灵世界。周立波的社会活动和文学实践与内心深处坚不可摧的革命思想紧密相连。南下北上期间，他完成了思想上的转变。通过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他确定了自己的革命目标和文学方向——全心全意为工农兵服务。

如果说“随军南下”是周立波第一次对中国革命的深度介入，那么“进入东北”就是他响应革命号召实践革命理想的鲜明体现。抗战结束后，东北地区的战略价值凸显，1946年7月至9月，中共东北局发动约一万两千名干部下乡开展革命工作，周立波是其中之一。同年10月25日，他奔赴松江省元宝镇(今黑龙江省尚志市)进行土地改革运动，访贫问苦扎根串连，广泛发动人民群众，肃清反动封建势力，使贫雇农获得了应有的土地，取得土地改革的胜利。1947年5月，周立波调至松江省委宣传部工作。

土改期间的生活经历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其创作出第一部长篇小说《暴风骤雨》。1946年5月至10月，他完成《暴风骤雨》上册，小说于1948年4月由东北书店出版。1948年7月13日至1948年12月2日，他完成了《暴风骤雨》下卷，小说于1949年5月由东北书店出版。《暴风骤雨》以历史事实为基础，以文学虚构的方式演绎，形

成了历史和文本的互文。小说广受好评，被当作实际土改的示范手册，获得了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

此外，周立波在东北期间还写过一些短篇小说、散文和论文，如短篇小说《金戒指》、散文《毛主席的心有窝棚大》《老者安之》《关云凤出担架》、论文《谈谈鲁迅先生的杂文》《纪念高尔基》《我的两点意见》。这些写作反映了他对东北生活的真切感受，以及对文学创作的深入思考。

除了文学写作，周立波还是一名出色的编辑。他在1947年5月负责编辑《松江农民》报，并于次年7月调往东北文联，担任《文学战线》杂志主编。他遵循“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积极关注工农兵生活和生产的文章，大力培育新人和工农作家。他注重采用民谣、儿歌、快板、小调等民间文艺形式，倡导报纸杂志以明白易懂的文字风格吸引广大读者。这些措施丰富了文学创作，提高了农民的文化水平，对东北文学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学界关于“周立波在东北”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对周立波代表作《暴风骤雨》的研究。在新世纪之前，学者主要从方言俗语、人物形象、艺术风格等层面考察该小说。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顾琅川、徐志祥、王国柱、王原璞等学者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进行的比较研究。新世纪以来，学者们开始从版本学、图像学、阐释学、身体美学和乡

土伦理等角度进行解读。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暴风骤雨》的版本变迁研究。1987年，胡光凡的《从手稿和版本看周立波对〈暴风骤雨〉的修改》通过小说手稿的反复修改揭示周立波在艺术追求与政治规约之间的取舍。新世纪以来，程娟娟、张铭、马亚琳等通过《暴风骤雨》的版本改动，考察背后的时代原因以及小说内在叙事矛盾的偏移。

第二，对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进行细致勘察。周立波在东北期间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和担任编辑的经历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庄汉新、胡光凡、李华盛、邹理等人以年谱整理的方式全面呈现了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详尽描述周立波参与土地改革运动、创作《暴风骤雨》以及办刊办报经历。

第三，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关系研究。吴丹的《周立波在东北的社会活动与文学创作研究》探讨了周立波在不同身份下，与东北碰撞所产生的独特审美意义。李博权的《“工作队下乡”与“东北”叙事——重读周立波〈暴风骤雨〉》从“工作队下乡”模式与解放战争下的“东北叙事”之“同构”关系出发，重新审视了该小说的文学价值和社会意义。

周立波在东北的革命工作和文学活动对当地社会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为中国文学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茶子花香逸三湘

□刘启民

“邓秀梅赶到清溪乡，天色还不晏，家家的屋顶上已经飘起了灰白色的炊烟。”《山乡巨变》里邓秀梅那样新鲜、欣喜的心情，带着周立波自己的生命痕迹。正如邓秀梅初来清溪乡，1955年的秋天，周立波携夫人和小女儿，从北京市迁到了湖南益阳郊区桃花仑乡的竹山湾，重新回到了阔别20余年的家乡，迎来了生命的金秋。他不仪亲自参与益阳农村的农业合作建设，在与乡亲们同吃同住同劳作中收获了“康健的、无挂无碍的”甜蜜生活，更是在深入农村生活的选择里，得到了生活经验的深深滋养，迎来了创作的丰收。《山乡巨变》《禾场上》《山那边人家》《盖满爹》《卜春秀》等都孕育于这一时期。

《山乡巨变》分为正篇与续篇，周立波一边参与合作化生产一边写作，从1956年6月动笔，写到了1959年的冬天。小说正篇从县委团委书记邓秀梅人清溪乡开始写起，展现干部们组织、动员农民入社的过程，写到常青初级农业社的成立。续篇则展现常青社转为高级社以后的生活面貌，呈现出合作化运动中的路线斗争与自我矛盾，最后以欢庆丰收的结局来收束全书。该书之所以面世60余年来广受读者欢迎，跟作者用真情和匠心塑造的小说艺术风格有关。浓郁的生活气息、清新的泥土芬芳、明丽的地方色彩，都让小说弥漫着南方山乡的水灵质感。在雅致秀丽的山水景致中，点缀着鲜活鲜亮的湘民风俗，跃动着人们在合作化运动中自由创造、幸福劳动的蓬勃生动的时代气氛。

从1955年到1965年，在益阳农村落户的周立波还创作了20余篇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反映时代风貌上稍逊于《山乡巨变》，却在展现湘中农村富有意思

的生活、融灌情境交融的抒情境界取胜。《禾场上》是展现农村生活意趣的典型例子，它描写了一个凉爽的夏夜，从县里下来的合作化工作组组长到众人歇凉的禾场上关怀、考察的场景。在惬意、和乐的氛围之中，在乡亲们调侃、逗耍的情景里，鱼水相融的关系尽显体现。《山那边人家》则尤有抒情意味，新郎新娘在婚礼中流露出对于未来幸福生活的憧憬，映衬着远近高低的笑声，连同山野之上肥美、翠青的原野，整个山乡似乎都在共同激荡着生活的甜蜜。如果说《山乡巨变》反映出周立波记录时代的激情，那么这些更短幅的写作，则承接了周立波对家乡赤诚的爱，地方风俗、生产情境、各式人物等更为芜杂丰富的生活内容，都一一被纳入进来，并被用心地裁剪，变成一幅幅精致动人的南方山乡生活画。

周立波回湘之后在创作上的丰富收获，源自于他在益阳建立的“生活基地”。他不喜欢走马观花，更愿意深入人民群众里，从行动到感情，都真的生活在他们中间。周立波在大塘、桃花仑和邓石桥几个乡都参加过当地的农业合作社建社，还担任过桃花仑乡委员会的副书记，熬夜开会、串联动员、欢庆大会，这些后来被写进小说里的情节，都是周立波亲自参与过的。干部们开会前放松打扑克、村口的破败土地庙、善良而缺乏城府的亭面糊、忠厚可靠的“婆子”李月辉……这些鲜活可感的细节、人物，亦诞生于奔赴群众的选择之中。“描写熟透了的地方和人物，往往笔尖一接触稿纸，形象和场面自然从脑子里洋溢出来，那样写出的东西，才会真正有生命”。周立波曾动情地总结自己的创作之路。



周立波

周立波也把“建立创作基地”的写作经验传授给了湖南的青年作家们，很好地提振了当地文坛的风气。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20世纪60年代初，未央、谢璞、向秀清、孙健忠等青年作家从各市州被抽调到湖南省文联创作组从事创作。

在省城长沙司马里王家菜园里，这些青春年少的小伙子终日放声歌唱、闹耍，没过多久笔下就没有了墨了。时任省文联主席的周立波诙谐地称他们是“菜园”里的“叫鸡公”，告诉他们，只有扎扎实实地去生活一线，才能创作出好的作品。在周立波的教导下，“叫鸡公”们离开了“菜园”，下到了农村火热的生活中，为当时的湖南文坛，奉献了多部馥郁着泥土芳香的佳作。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延安，革命圣地的光芒照亮现实

□邓谦林

20世纪30年代后期和40年代前期，延安是当时承载着国人的希望和众多有志知识青年向往的革命圣地。周立波在1939年12月到达延安，1944年11月随同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南征，他在延安的时间虽然只有5年，但是在此期间他的思想得以进一步明确，坚定了工农兵文艺方向。

革命圣地的光芒照亮了灰暗的现实，周立波在长沙一中学习期间就受到了新思想的影响，主张自由、革新。30年代初在上海从事左翼文化活动，并因此被捕入狱。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中国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个人遭遇和社会境遇，让人深感绝望。正如周仰之《我的祖父周立波》所说，延安当时虽然荒凉、偏僻、贫瘠，生活艰苦，“但它却是立波和当时很多年轻人心目中的圣地，是当时腐败、糜烂、贫穷、无望的在亡国边缘挣扎的中国土地上的一方净土”。所以，他在延安找到了归属感，他的诗作中充满乐观主义精神。

他的抒情长诗《一个早晨的歌者的希望》，鲜明地反映了从国统区到达延安后那种愉悦昂扬的心境。这里的生活“有很多美丽的东西”“真诚统治着人境”。在《我们的一切》中，他直白地宣告，忧愁、饥饿、鞭子吓不到我们，“我们有一切……不但是希望，不但是芬芳，不但是春天的花朵，夏天的温暖”。他真诚地热爱延安，热烈地歌颂光明，在以后的创作中，也保持了这种明朗的风格。

1940年到1942年，周立波在鲁艺文学系讲授“名著选读”课。他选读的有《红楼梦》《阿Q正传》等，但选读得更多的是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屠格涅夫、司汤达、高尔基等外国作家的作品。他不辞辛劳地在昏黄的油灯下备课、写讲稿，为培养党的文艺人才倾注赤诚和心血。他的课不仅文学系的同学喜欢，其他系的同学甚至一些教职员也去旁听。这是因为他选读的是曾深深

打动过他的名著，记者的经历也让他的课堂表述有吸引力，而且他注重分析小说中的人性和表现人性的方式，因而讲授得贴近人生又有趣味。比如，《司汤达和他的〈贾柯陶的女主持〉》一课，他一开始就强调这次课要研究的主题是“对于人生的认识和对于此所认识的东西的表现”，主要探讨人性和美学这两个方面。他选读的主要是批判现实主义小说，比较契合当时中国普通读者的审美期待，但是他的“人性论”解读与后来延安的文艺思想是不相符的。所以，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他反思批判了自己“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小资产阶级情趣，表示要深入生活、大众化，真诚地为工农兵而创作文艺作品。

除了在鲁艺做教员外，周立波也开始尝试小说创作。他以自己30年代初的牢狱斗争经历为素材，在1941至1942年间陆续创作发表了《第一夜》《麻雀》《纪念》等5篇短篇小说。此前，他在翻译、理论批评和散文、诗歌创作等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绩，但这些短篇小说尤其展现了他的创作才华。从此以后，他渐渐地将创作精力转到小说写作上来。这些短篇写得真实感人，但主要写的还是个体的苦难，阶级意识尚不明显。

1942年5月，周立波参加了延安文艺座谈会，会前还与何其芳、严文井等人受邀到毛主席家里吃饭谈文艺问题。周立波后来多次撰文谈到《讲话》的意义和对他的影响。1943年4月，他在《后悔与前瞻》中说，“参加了这个会以后，我觉得受了很大的教育”，毛主席的讲话让他改变了在乡下和前方时的“做客”心态，学会了对民众语言的运用。

因为他在文艺思想方面的转变，才有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长篇小说的诞生。延安对周立波文艺道路的影响，对国统区来延安的文艺工作者来说是颇具代表性的。(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北京生活匆匆过客

□卓今

喜》等。

周立波在北京期间倾注精力最多的是工业题材长篇小说《铁水奔流》。从1951年2月开始，他多次深入北京石景山钢铁厂体验，深入了解高炉的大修，休息时间与工人们聊天。创作完成第四稿时，召开了座谈会。前后共修改了6遍，多方听取意见，在1955年正式出版。他曾《〈铁水奔流〉的创作》一文中说：“一进城，就想了解和反映工人生活和工业建设。”作品塑造了李大贵、范玉花等人物形象，花费的精力不亚于《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但终因生活积累不足，思想价值和艺术价值无法与这两部作品相媲美。他自己在创作谈中谈了许多困惑，也总结了经验和教训。

《周立波文艺讲稿》收录了近40篇创作谈、文艺理论和批评文章，其中一半多是在北京期间完成的。《山乡巨变》《暴风骤雨》都以方言艺术为作品增色，他在《谈方言问题》中认为，采用方言，不但不会和“民族的统一的语言”相冲突，而且可以使文学创作的语汇丰富、语法改进，更适宜于表现人民的实际生活。他倡导方言写作应该有所删减，有所增益。其中有4篇是《暴风骤雨》的创作谈。还有谈音乐、谈剧本、谈小说写作手法等，通过这一文体形式，表达了自己的创作理念，也解答了读者的困惑。从周立波的一系列创作谈中，可以理解他的创作意图，采取某种艺术手法和人物塑造的依据。

在北京生活期间，他将参与拍摄的《解放了的中国人》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文艺界为抗美援朝购买“鲁迅号”飞机，也将《暴风骤雨》所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奖金全部捐献给中国人民志愿军作为购买书报的费用。总体来说，与早年在上海、延安、东北的生活相比较为稳定，他也可以更从容地实现精神追求。

(作者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所长)